

人文书写与 地缘景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北京印象

董琦琦 编著

學苑出版社

人文书写与 地缘景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北京印象

董琦琦 编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书写与地缘景观 :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北京印象 / 董琦琦编著 .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77-5023-2

I . ①人… II . ①董… III .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 世纪②城市文化—文化史—研究—北京市—20 世纪 IV . ① I206.6 ②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7785 号

出 版 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李 耕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 010-67601101 (营销部)、010-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系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人文书写与地缘景观：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北京印象（2011D00502200000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董琦琦，1981 年出生，女，文学博士，副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在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语言文化系任教。先后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福建论坛》《江汉论坛》《齐鲁学刊》《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委办局级项目若干项。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档案	1
一、城市发展史溯源	7
二、城市隐喻	16
三、城市文化记忆	28
第二章 城市与文学的互文性关系	37
一、文学地理景观	38
二、城市文学的生产与消费	44
第三章 城市书写的空间类型	49
第一节 空间民族化	50
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51
二、“他者”的属性及特征	55
三、“他者”对城市书写的影响	69
第二节 空间政治化	78
一、天安门的现代转换	78
二、天安门叙事	116
第三节 空间性别化	155
一、现代都市的沉沦与迷失	156
二、失落精神的守望与召唤	160
三、异质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164
第四章 城市书写的身体体验	167
第一节 感受城市的诸种方式	168
一、触觉与热量	168
二、嗅觉与气味	172

三、视觉与印象	176
第二节 触摸北京的几条路径	182
一、可闻的	183
二、可品的	196
三、可见的	199
第五章 城市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	203
第一节 关于“认同”的学理溯源	204
一、什么是认同?	204
二、谁需要认同?	207
三、去哪里寻找认同?	211
第二节 20世纪20—70年代:“老北京”的消逝与 “新北京”的生产	214
一、“老北京”的遗失:以城墙与城门为例	216
二、“新北京”:“改写”胡同与“家—X” 空间生产	226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记忆素与“文化北京”	241
一、京味小说中的记忆素及其构成	242
二、记忆素之一:人物	243
三、记忆素之二:行动	249
四、记忆素之三:空间	253
五、记忆素之四:情节	258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现代都市与“怀旧北京”	262
一、作为“景观”的现代都市	262
二、王朔笔下的“新北京”记忆	269
三、怀旧“老北京”	274
后 记	287

第一章 城市档案

珀涅罗珀·赖芙莉身为英国当代杰出作家，其在《心灵之城》一书中全方位展现了伦敦这座古老城市在 20 世纪发生的异动与变迁。小说借助主人公马修·霍兰德的感官体验巧妙绘制了伦敦城市印象：“城市给了他深深的冲击。在城市里，他看见昨天和遥远的过去，看见贫穷和富有，看见优雅和粗俗。他眼前是一个万花筒，各个时代、多种风格的建筑缤纷呈现：有的模仿哥特式教堂，有的纪念希腊神庙，各自展示着这样、那样的象征和意象。他看见圆柱、山墙和门廊并存。他看见维多利亚时代的粉墙、20 世纪的混凝土、乔治亚时代的砖块同在。他发现城市既弹性十足又冥顽不化，他明白了它的漠然与中立。/ 他还听到城市以不同的腔调言语……它们的声音从意第绪语跨越到乌尔都语，演奏出一首不和谐交响曲，它们的声音亦是一份环绕全球的演讲，从莫斯科出发，经过希腊和土耳其、经过遥远的爱尔兰和印度、经过加勒比海直至悉尼，每一个地方都发出共鸣。如果让城市将它们各自的经验娓娓道来，那么这个漫长的故事将涉及

每时每处、包含迫害和灾难、兼容成功和不幸。”^①在霍兰德眼中，城市时而仿佛万花筒，五彩缤纷，气象万千；时而好像交响乐，抑扬顿挫，起伏跌宕；贫穷与富有同在，优雅与粗俗共存。城市总是阴晴不定，时而兼收并蓄，时而故步自封，时而通达开明，时而顽固不化，让人爱不释手，却又捉摸不透。

自城市诞生以来，便积极投身于人类文明建设。尤其于当代人而言，城市更多意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场所。面对古往今来的城市变迁，我们不禁想要追问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你赖以依存的城市面孔究竟为何？当依循记忆勾勒城市印象时，其拟选择以何种方式浮现在你头脑当中？凝神屏息后方才彻悟，完满整一的城市样貌似乎根本无从寻觅，存留在记忆深处的不过是些断片、剪影罢了。正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约翰·伦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所描述的：“走进一个大城市，你当然能够辨别建筑、看见人群、找到地点、弄清楚每一条道路通向何方，然而，它的整体身形却似乎总在故意回避着我们。城市越是庞大，在我们心灵中呈现出的印象却越是支离破碎。”^②除此以外，充斥在支离破碎的城市镜像中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它们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持续不断地对城市现实进行干预。就此

① 引自[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导言第1页。

② [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导言第2-3页。

而论,“城市就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体现在某些做法和话语中。”^①

目前由于缺乏普遍公认的思想体系用于城市叙事,所以学界以此为中心形成的问题场域也是零碎、松散的。有意思的是,城市研究显而易见的缺失与弊病反而回应了城市现实,与之形成了某种契合关系,在为城市真相做实录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学科属性进行着言说与规定。或许可以说,城市研究现阶段选择的介入路径是最为有效的。

作为一种实在,城市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随处可见人为斧凿的痕迹。昔日其凭借欣欣向荣之势与乡村文明区别开来,如今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而愈发强大兴盛,有关城市的一切,于当代个体而言,不可能、也无法置若罔闻。

然而凡此种种一旦落实到核心议题,“城市”又总是表现得恢怩悒怩。正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又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它起些什么作用?达到哪些目的?它的表现形式非常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城市的发展,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城市的起源至今还不甚了然,它的发展史,相当大一部分还埋在地

^①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下，或已消磨得难以考证了，而它的发展前景又是那样难以估量。”^①今天科学技术虽然高度发达，但是有关城市的起源、演变、发展乃至衰亡问题仍旧不可穷尽，至于未来前景如何更是无从预测，或许正是因此方才导致历代学人在研究实践中回环往复、欲罢不能。

“城市化”究其根本是“现代化”的一个分支，“现代性”作为对现代化进程总体性特征的概括与总结，在城市研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为问题意识使然，当我们从不同维度审视“现代性”范畴时，围绕其生成的知识系统和话语逻辑足以衍生出漫无边际的关系网络。周宪、许钧先生曾对“现代性”一词之意涵做出过不同层面的界定。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现代性”标志着与传统异质的新时期；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之影响广泛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现代性”与数以千计的现代体验密不可分。^②

现代性问题虽说发轫于西方，但是随着各国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它已跨越民族边界，发展成为一种世界现象。较之于西方国家而言，“现代性”的实施与践行在我国可谓是一波三折。自晚清以来，整个社会纳入现代化进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随之而来的机遇和挑战。鸦片战争失利后，中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玲、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 [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总序第2-4页。

华民族一改闭关锁国的状态，沦为帝国列强瓜分对象，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痛定思痛，重新审视现有文化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西化舶来品不同，这是一种截然迥异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对中国社会的翻新与改造是深刻的、彻底的。改革开放以降，现代性协同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应对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后果与效应。较之于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结构而言，城市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剧烈的。

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城市代表，面对上述历史转折，其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上海是中国最早崛起的国际都市，应当说充分见证了西方现代性对中国城市的塑形功能，贺桂梅称之为“一种殖民现代性”^①。20世纪30年代，一批文人集中表现了上海这一充盈着消费主义色彩的地域空间内的生活景观，为上海城市研究提供了供不应求的文学文本。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上海城市建设始终名列前茅，骄人业绩使之萌生出城市想象及主体身份确立的强烈诉求。顺应现实需求，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通力合作下，上海研究成为海外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于北京城市研究而言，上海城市研究已经形成气候。

① 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2页。

如果说上海代表时尚前卫的话，那么北京则意味着深沉厚重。2000 多年的建城史、800 多年的建都史令北京成为“乡土中国”的典范，其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传统”的笃信与坚守，且后者早已潜移默化渗透至城市的空间形态，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及精神构成当中。^①在西方现代性观念进驻过程中，北京并不像上海表现得那般随遇而安，而是在应对现代变革的同时，时不时地驻足停留，对传统进行追忆和缅怀，其间矛盾与冲突、挣扎与焦灼无处不在。就此而论，北京赋予“现代性”更多阐释空间。21 世纪初，陈平原先后发表了《“北京学”》《“五方杂处”说北京》《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文章，希望建立起与“上海学”相呼应的“北京学”。以此为目标，陈平原、王德威又合作编著了《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一书，集中收录了北京研究的重要学术论文，它们普遍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研究是片面的，此种以上海为研究对象的单一维度的城市研究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城市发展之全部。在这方面，贺桂梅的点评最具说服力，她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研究“隐晦地将革命（社会主义）历史作为非现代（或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剔除出想象的视野；同时，其所关注的面向主要集中于与西方产生碰撞的层面，而忽视（或无法纳入）中国城市记忆与‘现

^①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47 页。

代’相抵牾的部分。”^①在此意义上，北京城市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为城市历史的重新书写提供了可能。

一、城市发展史溯源

“弗洛伊德写道：衍生于童年回忆的梦与儿时记忆的关系，类似于罗马的某些巴洛克宫殿之于古代废墟的关系，其人行道和纪念柱为更近代的结构提供了素材。在过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都市（通常指罗马）拥有积淀而非简单累加的历史，在弗洛伊德那里它常常被喻为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城市也往往缺乏他要描写的心理空间概念的充分表达）。废墟、遗址与城市建筑显示了过去对现在不断产生影响的环境。作为暴力与破坏的提示，作为过去残留到现在的东西，废墟暗示了历史的创伤。由于废墟是过去的碎片，是凌乱地充斥着现在的物质残骸，它使城市文化的现实昭然若揭，在此，过去萦绕着现在。恰如精神分析学致力于揭示过去作用于现在生活时所产生的影响力，城市文化研究必须考察历史，从而了解城市的想象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城市都被萦绕着，它们是过去生活、过去城市的灵魂的积淀。”^②过去萦绕在现在周围，历史碎片残留于当下时空，这是城市

① 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2页。

② 本·哈莫：《方法论：文化、城市和可读性》，见《城市文化读本》，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研究无法回避的事实，所以其必须考察历史，了解城市的发展潜力及被想象的各种可能。

关于城市起源一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公元前7000年前后，人类步入农业文明时代，以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革命，使居无定所、以渔猎和游牧为主的原始人逐渐演变为生活安定的农民和牧人，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在距今5000年左右，世界主要农业区相继涌现出了一批早期城市，它们虽然规模有限，却已跻身为经济繁荣、王权与神权并重的空间场域。上述文字包含了如下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人类在步入农业文明之前，尚无剩余食物用于交换，贸易往来不可能发生，更没有社会分工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城市的诞生无从谈及；二是早期城市除了为人类提供身体庇护外，更突出的还在于让人类在神圣光晕的笼罩下领受恩泽与福祉。

言及城市承担的各项功能，约翰 R. 拉瓦蒂（John R. Lavery）的说法极富启示意义。他认为“这些早期的城市中心承担着几种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例如，保护自己的居民不受外来者的侵犯，为其居民及畜牧提供安全地带，同时也被用做进行宗教活动和礼仪庆典的场所，又并做当地社会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中心。”^①拉瓦蒂对人类早期城市功能的概括与描述应当说比较全面的，这一点于中西方城市发展史而言

① [澳]约翰 R. 拉瓦蒂：《城市革命》，见《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陈一筠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79页。

并无二致。如果说农业时代，包括之前的历史阶段，城市主要发挥宗教、军事功能的话，那么步入近代后，城市逐渐转型为区域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此过程中，从神圣到世俗、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路径是可以依凭的重要线索。

（一）从神圣到世俗

包括坟丘、墓葬、岩洞在内的人类最早的固定地面目标、纪念性的汇聚地点，或者作为神圣精神存在和权力的象征物，或者出于生命安危、生产劳作的需要，能够把具有虔诚信仰和虔信情感的个体定期或永久性地集中在一起，其中已经包含了建筑空间的概念，是城市发展的最初胚胎。相关礼仪形式内蕴的社会性、宗教性力量，连同原始情感体验在艺术活动中进一步被强化。此时，人的意识尚未自觉，无法理解上述内容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就是在此种无目的状态下催生出某种目的，开启了人类艺术之旅。

以上述空间建筑为中心，早期城市逐渐形成。约翰·伦尼·肖特认为这些早期城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在于世俗权威的统摄及宗教信仰的感召。他指出“城市的控制范围只能以中央政权的威慑能力所及之处为限。在城市里，控制作用一目了然：城墙把人们分隔内外。宗教的作用在于通过典仪、假借宇宙的要求建立社会秩序，但生活在边缘地区的人们却不是这种体系的一部分。因为离城市越远，宗教的感染力越

小。所以越边缘的地区，统治权力就越难以维持。”^① 城市秩序的确立是世俗权威和宗教势力协同合作的结果，围墙作为标志性建筑形式之一，将城市内外空间明显区隔开来，不同程度地实施着权力统治。

在肖特看来，早期城市与其说是行政权力单位，毋宁说是精神家园，它们是尘世通往彼岸世界的重要桥梁。“早期城市正是宗教与世俗的结合点，在其中心地段，重重寺庙高耸入云，联结着俗世与天国，它们是被崇拜者与崇拜者之间以石刻就的契约，以建筑的形式沟通着此时此世与过去将来。这也意味着，相信神高高居住在天堂里的天空中心论信仰渐渐取代了认为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传统，宗教信仰逐渐发展成形。”^② 早期城市连接着神圣与世俗，在由泛神论向笃信神是有位格的观念转型过程中，它们以及矗立其中的地标性建筑发挥了强大有力的引导与规训作用，其凭借有形的空间形式，于无形间建立了合乎规范的社会秩序与宗教信仰，弥补了行政权力威慑效应之有限与不足。

众所周知，待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经历了长达 5 个世纪之久的混战局面，各方力量的博弈与抗衡使之成为很难被描述的一段历史，然而正是这段动荡不安、倍受争议的历史，在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发展路径由神圣走向世俗。芒福

① [英] 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0 页。

② [英] 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0 页。